

帝國的傲慢與偏見

——評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中國觀》

● 李凱航



在《近代日本的中國觀》中，子安宣邦刻意選擇了幾位立場看似矛盾，但在一個更高的認識論的層次上又彼此關聯的思想家，以闡明「中國的問題即是日本的問題，它決定了昭和日本的國家命運」這個既簡單又深刻的主题。

子安宣邦著，王升遠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觀》（北京：三聯書店，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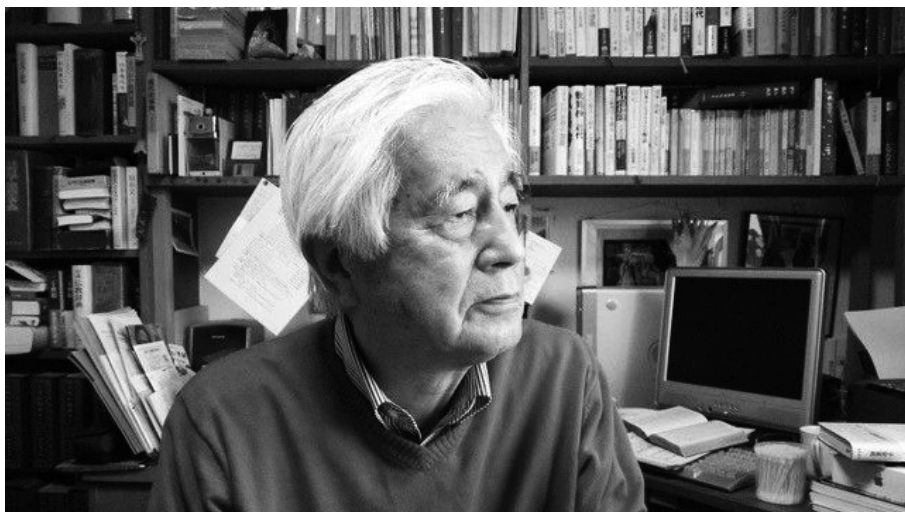
一 導言

「近代日本是如何將大國中國從自己的意識構圖中抹消掉的，且

日本是怎樣確立起自己的一國中心主義的呢？可以說，日本的近代史也就是把東亞中的中國從日本的政治地理上或者從日本人的意識層面抹消的實驗過程。」^①大阪大學文學部名譽教授子安宣邦如是總結道。

子安是日本著名思想史學者，日本近代思想發展的研究論著頗豐，學術影響力毋庸置疑。在2012年於日本出版、2020年翻譯成中文的《近代日本的中國觀》（以下簡稱《中國觀》，引用只註頁碼）一書中，子安刻意選擇了幾位立場看似矛盾，但在一個更高的認識論的層次上又彼此關聯的思想家作為個案，以闡明「中國的問題即是日本的問題，它決定了昭和日本的國家命運」這樣一個既簡單又深刻的主题（頁1）。子安選擇的人物既包括將中國民族主義工具化的北一輝、內藤湖南，也有同情中國革命的橘樸與尾崎秀實；既有強化「亞細亞的專制」理論的森谷克己與親身走

* 本文獲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近代日本琉球學的成立與展開研究」（19C10255006）、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青年課題「『黃禍論』與明治日本的民族共同體想像研究」（2019ELS002）、2021年東華大學外語學院本科教改項目（21WYBK004）資助，特此致謝。



子安宣邦的方法論大致形成於二十世紀末，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識/權力」理論的影響。(資料圖片)

入中國農村進行社會學調查的平野義太郎，也有深入內地作戰、親歷戰爭殘酷的石川達三；甚至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年代裏受西方歷史理論影響、試圖從中國尋找「近代」的竹內好、加加美光行、溝口雄三等，即所謂「將亞細亞(中國)作為方法」。這些思想家的譜系可謂是從左至右，而時間上則是從明治時期延綿至今。他們都有着鮮明的問題意識，而中國則始終是這個問題意識共同的背景。

如果從子安自身的學術生涯來看，《中國觀》可謂是繼《怎樣詮釋「亞洲」——近代日本的東方主義》、《何謂「近代的超克」》以來^②，又一部從「知識考古學」的視角重審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力作。據趙京華研究，子安的方法論大致形成於二十世紀末，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識/權力」理論的影響，開始解構由戰後初期丸山真男所奠定的思想史圖景，即某種為了建構戰後民主主義思想基礎從而在「前近代」江戶時期尋找「近代性

思維」的理論方法——子安稱之為「思想史的虛構」^③。

如果說子安在二十世紀的思想史研究集中在江戶時期及其之前的話，那麼新世紀以來，子安則把研究方向轉向了明治時期以後，而他所解構的對象則從丸山真男轉換為竹內好。前者透過江戶時期尋求「近代」，後者則透過中國尋求日本所缺乏的那種「近代」。子安發現，竹內好的這種預設前提妨礙了其真正理解中國這個認識對象，也在歷史上造成了日本政府許多政策上的錯誤。如果要避免重蹈覆轍，那就必須擺脫這種「近代主義」式的思維方式。正如福柯所指出的一樣，「要在沒有一種目的論能預先限制的不連續性中分析思想史；在沒有一個預先的範圍能封閉的擴散中測定思想史；……問題在於剝離思想史的一切先驗的自我欣賞的成分」^④。正是基於這樣的研究視角，子安開始重審近代日本的中國觀，以及圍繞此課題而展開的「亞細亞主義」(「亞細亞」為“Asia”〔亞洲〕

子安把研究方向轉向了明治時期以後，解構的對象則從丸山真男轉換為竹內好。前者透過江戶時期尋求「近代」，後者則透過中國尋求日本所缺乏的那種「近代」。